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综述(1987-2016)

——一项基于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

杨华波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口译史研究是口译学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口译教学和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口译史逐渐成为口译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相关学术会议和专题刊物助推了这一研究领域迈向新的阶段。本文采用计量分析法统计了1987至2016年30年间国内外口译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对比了国内外研究在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并对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相应的启示。

[关键词] 口译史; 口译研究; 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19)04-0071-07

1 引言

国内口译史研究起步较晚,主要的成果便是黎雅秋(2002)的《中国口译史》,而国外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 Alfred Herman(1956)和 Evgeny A. Gofman(1963)等人撰文讨论西方古代口译史和同声传译的由来。经过七十年代的沉寂,口译史方面的论著开始逐渐增多(Kurz,1985,1991; Gaiba,1998; Roland,1999),近年来更是逐渐形成热潮(Baigorri-Jalón,2004,2014; Torikai,2009; Takeda,2010; Fernández-Ocampo & Wolf,2014; Wolf,2016)。口译史研究到21世纪后才迈向新的台阶,促进了口译研究的全面发展,对口译教学和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口译史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推进翻译史的研究。论文是集中体现某一学科发展动态的风向标,本文拟通过文献计量的方式统计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概括其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后续的发展指明方向。

2 文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库统计了1987-2016年30年间国内外所发表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题集论文和博士论文四大类文献。由于口译史研究总的成果并不多,因此,本文参考了检索结果中的英语翻译,尽可能地非英语撰写的外文文献也收录在此数据库中。国外论文主要通过 BITRA^①、TSB^②等在线数据库检索,还通过 John Benjamins 和 St. Jerome 的出版目录进行检索。国外博士论文的检索主要参

考 CIRIN Bulletin^③。此外,还参考了 Google Scholar 的检索结果。检索项为 interpreting 和 history,分别按关键词、主题和标题获得初步文献,在此基础上通过摘要和全文阅读进行二次筛选,最终通过整理共得到期刊论文 86 篇、会议论文 12 篇、专题集论文 6 篇、博士论文 3 篇,总共 107 篇。国内(含港澳台)的文献中,大陆地区主要通过 CNKI 进行检索,按照关键词和主题词“口译”“译员”“史”进行交叉检索,共得到期刊论文 28 篇、会议论文 3 篇。港澳台地区国际化程度较高,其口译史研究成果若以英语发表也算作国内研究成果,共得到期刊论文 26 篇、会议论文 5 篇。国内总计得到期刊论文 54 篇、会议论文 8 篇。因此,本研究最终收集到的中英文文献共 169 篇,其中期刊论文 140 篇(占 83%)、会议论文 20 篇(占 12%)、专题集论文 6 篇(占 3%)、博士论文 3 篇(占 2%)。

3 资料分析

3.1 文献来源及分布

通过检索可知,口译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来源于期刊论文,特别是 1999 年 *Interpreting*、2016 年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和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 发表的口译史研究专刊上,这成为窥探口译史研究的前沿窗口。此外, *Meta*、*Babel*、*Perspectives* 也是发表口译史论文较多的刊物。由于以往口译研究的学术会议并未将口译史作为重要议题,因此口译史研究的会议论文较少。2014 年 5 月在日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6 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福建在新加坡主流媒体中的形象构建”(编号: FJ2016B124) 与 2018 年度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口译测试的反拨效应实证研究”(编号: 18ZD020) 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4-25

[作者简介] 杨华波,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口译研究。

本东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口译史研讨会,但本次会议只是专家学者的内部交流,受限于规模,所提交的会议论文数量也有限。该研讨会的论文集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于 2016 年由 John Benjamins 出版,成为国外口译史研究会议论文的重要来源。博士论文是某一领域研究水平日益提升的显著标志,但通过检索语料库,国内暂时还没有以口译史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而国外却有三篇。国内来看,港澳台地区的大部分口译史研究成果发表在海外刊物,而大陆地区除发表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翻译史研究》等期刊外也散见于其他人文社科类刊物。

3.2 历年文献数量统计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口译史研究的成果在期刊、论文集和博士论文的分布上并不均衡。此外,从发表时间上来看,不同时期的产出也有很大的差异,口译史研究经历了 1999 年前的缓慢增长,到进入新世纪后的快速发展,直至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总体而言变化幅度较大,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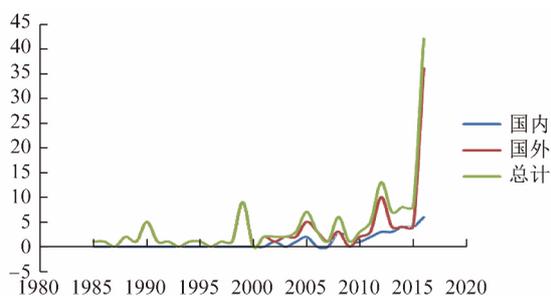


图 1 历年文献分布(1987-2016)

由图 1 可知,1990 年、1999 年和 2016 年是国外文献发表较为集中的三年。1990 年由 John Benjamins 出版的专题论文集 *Interpreting: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的第一部分聚焦口译史研究,可以视为口译界自觉将口译史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开始。虽然此后口译史研究逐渐陷入低潮,但随着口译研究整体上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口译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投身其中。新世纪到来前夕, *Interpreting* 专刊介绍了口译史的最新成果,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口译史研究有所起伏,直到 2016 年才迎来新一轮的增长,以口译史为议题的研讨会陆续召开,各期刊也设置专刊发表口译史研究的论文,这一切都为口译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反观国内的口译史研究,21 世纪前除了有陈世明(1996)、李德宽(1997)和黎难秋(2000)等少数几人的研究外乏善可陈,研究成果极少。总体而言,

国外口译史研究的发展轨迹与口译研究总的发展趋势一致,而国内则没有很好地融入这一趋势。虽然历年的论文数稳中有升,特别是在 2009 年后呈明显上升趋势,但仍远远落后于国外。

3.3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主题的分类和比较

尽管口译史研究多将译员作为研究核心,但其主题的多样性却远远超出了对译员本身的研究。作为口译史研究的主导人物之一, Baigorri-Jalón (2006: 106-107) 为口译史研究划定了丰富多样的研究主题,包括某一历史时期的口译史、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口译史、机构组织中的口译史、译员个人史、法庭口译史、译员培养史、文学作品或电影中的译员、手语翻译史等等。我们认为,这一划分基本涵盖了口译史研究的主题,对口译史研究的系统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依据这一划分,我们统计了国内外口译史研究论文在各主题上的分布并比较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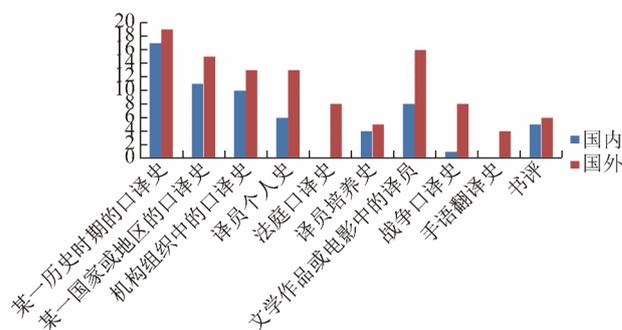


图 2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主题的分类和比较

从图 2 可以看出,国内外口译史研究在研究主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的口译史研究除了书评类引介性文章外,主要集中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口译史、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口译史或战争口译史,在法庭口译史和手语翻译史等主题的研究上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而国外口译史的研究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口译史(中世纪、二战时期)和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口译史(苏联、美洲)外,还包括机构组织中的口译史(联合国),更有国内研究中没有涉及到的国际组织中的译员史、法庭口译史、文学作品或电影中的译员和手语翻译史等主题。可见,国内口译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及国外。下面,本文将对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的主要主题进行分别论述。

3.3.1 某一历史时期的口译史

国内学者对唐代的口译史研究较多,主要有赵贞(2005)对唐代官方译官和香港学者 Lung(2016)对新罗译语的研究,后者认为唐朝时期活跃在东亚、

来源于朝鲜半岛的“新罗译语”是译员的代名词,他们不仅从事一般的口译任务,更从事后勤、商贸等其他经贸活动。口译活动源远流长,西方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了口译活动的明确记载。由于历史上的口译活动见诸文字的比较少,除了依赖于少量的文献外,还必须依靠考古研究,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壁画文字等图文记录探究较远历史时期的口译活动,这一点在 Kurz(1985)的研究中最为突出,他通过埃及法老陵墓上的图形文字证明,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了正式的口译活动。Takeda(2009,2010)的二战口译史成为考察某一历史时期口译史的典范,作者通过文献和档案资料再现了二战后日本国内广阔的口译活动。古罗马时代,译员还活跃在军事活动之中,彼时的他们往往会被贴上叛国者的标签(Mairs,2011,2012),这与二战后众多殖民地区的译员被判以战争罪不谋而合(Lan,2016)。国内外对古代口译史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探究口译活动产生的根源,也有利于探索译员角色的演变。

3.3.2 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口译史

口译活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交往的必要媒介,特别是那些对外交往比较频繁的国家,如中国、西班牙,口译是不可或缺的,在某些场合下,口译会对一国政治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约 21 世纪就有了外交活动,至迟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舌人”这类专职传译的低级官员。(黎难秋,2002:1-2)自此,口译活动的史实屡屡见诸于文献。关于中国古代的口译史,Lung(2011)在专著 *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中有较为详尽的描写,而在她发表的系列论文中(Lung,2005,2006,2013),作者将古代中国译员拔高到历史学家的地位,认为他们在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是历史活动的参加者和记录者。在国外,西班牙是最早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从十五世纪末开始到十九世纪长达四百年的殖民史中,不论在征服殖民地的伊始还是在建立稳定的殖民秩序之后,口译活动和译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十六世纪的腓力二世时期,西班牙还颁布了专门用来管理殖民地(如美洲)的法律,规定了出席法庭的口译员的方方面面,这是法庭口译作为现代社区口译的先驱。此外,译员在西班牙的宗教审判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西班牙的 *Alfaqueque* 研究团队成员 Alonso-Aragués(2004,2016)和 Sarmiento-Pérez(2011,2016)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近年来,受政治因素影响而口译活

动较多的国家也开始涌现出大量成果,Sibul(2014,2016)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追溯了爱沙尼亚在 20 世纪不同时期的口译史,是国别口译史研究的典型案例。

3.3.3 译员个人史

Pym(1998:ix)认为翻译史的研究应以译者为中心,而对译员的研究也正日益成为口译史研究的中心。20 世纪初,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这些组织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对话的平台,必定有一批译员参与其中,特别是二战后的联合国,其日常运转就不得不依靠一批专业素质过硬的译员。国际组织往往是口译新形式或新技术的试验场,如第一次正式的同声传译就在国际劳工组织内举行。此外,全球性或地区性事务也往往发生于这些国际组织内部,参与其间的译员是某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总之,国际组织中的译员不仅是技术革新的先导,同时也是某些历史性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对历史事实的还原也有重要作用。在国际组织译员史研究方面,Roland(1999:157-174)通过图文展示了 20 世纪那些最杰出的译者,Baigorri-Jalón(2016a)通过 Rabinovitch 家族的私人收藏追溯了联合国首席译员 Georges Rabinovitch 的一生。与国际组织中的译员史相比,非国际组织中的译员个人史也十分丰富。国外的译员个人史研究中,Baigorri-Jalón(2005)再现了德国会议口译员 Michaeli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等事件中的经历,探讨了会议口译职业化初期译员的活动轨迹;Harris(2002)再现了译员 Ernest Satow 传奇的一生,展示了他如何从一个译员成长为大使的经历。此外,Kurz(1991)强调了西班牙殖民者殖民印加帝国时期,审判其君主时译员 Felipillo 在其中的作用。在研究方法和材料来源方面,对于某些健在的译员,访谈是极其合适的研究方法,Bowen et al.(1990:23-33)通过采访 Irena Dobosz,再现了一个外交译员精彩纷呈的一生。译员的个人史研究不仅可以使口译史的研究深化到具体译员的探讨,还能够澄清相关的历史事实。此外,译员个人史的研究也能对译员的职业化和职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国外较为丰富的译员个人史相比,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韩洪举(2002)对林纾口译者的研究和陈巧玲(2010)对近代厦门口译员林鍼的研究。

3.3.4 法庭口译史

法庭口译由来已久,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和其美

洲殖民地广泛存在。在殖民统治和宗教审判等活动中,译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国外的法庭口译也是手语翻译开始走向社会的契机,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手语翻译就已经成为法庭口译中的必要辅助。(Stone & Woll 2008) 国外法庭口译史的研究场景主要是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这些场合下译员是不可或缺的。作为通晓多种语言的中间人,他们不仅要提供语言服务,参与战争的译员甚至还要指控战犯或接受战争罪的指控。Takeda (2010) 详细讨论了东京战争法庭中的口译问题,包括译员的来源、对译员的审判及其影响。Lan (2016) 通过二战后对服务过日军的译员进行审判,探讨了战争环境下译员的角色,通过细致的会话分析,展示了战时译员接受法庭审判的场景。

3.3.5 译员培养史

如何培养译员不仅是口译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口译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国外,殖民探险初期的译员主要来源于被绑架的原住民或被俘获的奴隶,通过非正式的训练他们得以胜任口译工作。在统治秩序开始稳定之后,口译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如西班牙随着殖民地各项制度的完善后颁布了专门约束口译员的法令。作为早期殖民主义的先锋,西班牙1573年就首次在美国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立了专门用来培养译员的学校 Santa Cruz de Tlatelolco 皇家学院,该学院拥有一整套的选拔和培养方案,以培养为殖民地政府服务的译员。(Arencibia Rodríguez 2006: 263) 欧洲大陆专门培养外交译员的历史也可以追溯至16世纪中期在梵蒂冈共和国大使馆内培养的 *giovani di lingua*。(Cáceres-Würsig 2012) 美国在20世纪初期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迫切需要培养掌握汉语、日语和土耳其语的外交人才,从而开展在远东地区的国际事务,因此美国国务院在1902年至1924年启动了专门培养外交译员的学生译员培训计划。(Sawyer 2016: 99 - 133) 随着译员需求量的增大和专业性的增强,20世纪40年代后的译员逐渐由高等或专科学校培养,这是译员培养中的一个显著变化。(Bowen et al., 1995: 255) 中国培养翻译官员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周朝,元代之后的中央政府均曾设立专门培养译员的学校。(黎难秋, 2002: 421 - 422) 目前,国内关于译员培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四夷馆等翻译学校的教学史(任萍, 2007) 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译员培养史(郭婷, 2012)。

3.3.6 战争口译史

在战争时期,口译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历史上的多次战争中都有译员的身影,他们可以调和或者加剧战争的紧张局面。在Pym (2016) 关于阿富汗战争中译员的危机分析(risk analysis) 中可以看出,译员的传译可以直接影响美军的决策。战争环境下口译史的最新研究集中呈现在2016年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 的专刊“Interpreting in conflict situations and in conflict zones throughout history”中,该刊论文体现了口译活动和译员在整个个人类冲突史中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进入21世纪后战争口译史仍然是个重要课题。(Tálpas, 2016) 战争口译史主要关注那些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中存在的口译活动和译员,通过分析译员在战争中的活动来展示译员的作用,如王宏志(2011, 2012) 就认为鸦片战争中的译员对战争局势和最后的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比较了中英双方译员的来源、类型、作用及各自阵营对译员的态度。此外,罗天(2011, 2012) 还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滇缅战役及重庆的军事口译活动。

3.3.7 文学作品或电影中的译员

翻译研究中通过文学作品研究翻译史早已有之,这一研究路径集中体现在Kaindl & Spizl (2014) 所编的论文集 *Transfiction: Research into the Realities of Translation Fiction*。由于数据的相对缺乏,口译史的研究也可以借鉴翻译史的研究方法,通过文学作品或电影重构特定时期译员的角色和各种口译活动。在Martinez Romera (2015) 的博士论文中,作者收集了1932年至2014年间含有口译场景的电影,展示了口译活动的历史、职业和艺术特点。Torikai (2016) 讨论了历史和真实的关系,指出日本小说家Yoshimura Akira的历史小说介于小说和事实之间,对研究译员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角色塑造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3.8 手语翻译史

手语和有声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两种形式,理应拥有相等的地位。Kellet Bidoli (2016) 简述了手语的使用和教育历史,指出手语翻译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只是隐匿于公共视线以外,并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首先在美国取得政府认可的职业地位。事实上,手语翻译在未取得职业地位以前就已经在法庭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Stone & Woll (2008) 指出,早在1725年的英国,手语译员就已经开始在法庭上进行翻译工作,这对司法审判的公正

性大有裨益。在没有手语译员参与的司法审判中,聋哑人可能会被判无罪,因为他们会因不能说话而被误以为没有分辨对错的能力。此外,手语翻译在法庭中的重要性在 Leahy(2016)的研究中也有体现。与国外相比,国内手语翻译职业化程度较低,研究起步较晚,水平较低,尚无手语翻译史的专门研究。(肖晓燕,王继红 2009)

3.4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材料来源及比较

口译史研究重点关注译员和口译活动在历史上的影响,但传统上译员和口译活动在历史文献中不受重视,且口译活动自身的属性使得资料难以保存,因此,材料往往决定了口译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往的研究以公开出版的史料为主,随着研究的推进,口译史研究中材料的来源逐渐多元化。国内外口译史在材料的来源和比较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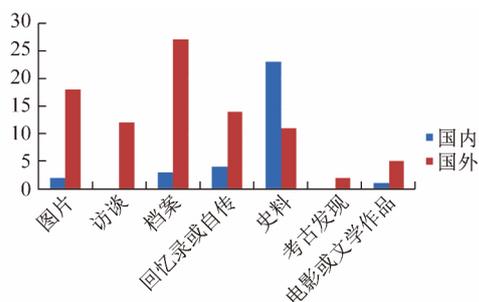


图3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材料的来源和比较

由图3可知,国外的口译史研究在材料来源上比较丰富,涵盖了图片、访谈、档案、回忆录和自传等各种资料;而在国内,史料应用成为口译史研究的瓶颈,对于国外研究使用颇多的图片、访谈、档案等材料则没有涉及,材料多样性不够,研究手法比较单一。不管是已经发布的档案还是那些未公开的档案,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宝藏,口译史的研究亦然。国外口译史研究中图片的使用屡见不鲜,Baigorri-Jalón(2016b: 167 - 191)通过图片展示了译员工作的隔间、存储语音的设备以及译员进行记录的场景。作者特别强调了图片在研究口译史中的作用,并认为那些未被研究的私人照片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国外的口译史研究中档案的使用也是其一大特色,多达27篇论文利用了档案资料,如Chernov(2016)通过共产国际的档案发现,早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就有同声传译的使用。

4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现状对比与思考

4.1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现状对比

国外口译史的研究起步较早,近年来更是迎来了飞速发展,2014年在日本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口译

史研讨会,2016年*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发表了以“Interpreting and interpreters throughout history”为主题的专刊,口译史研究的专题论文集*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也于同年出版。与此相呼应,口译史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这预示着口译史研究的蓬勃生命力,也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研究主题上,国外口译史研究囊括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口译史、机构组织中的口译史、译员个人史、法庭口译史、译员培养史、战争口译史等方面的内容;在研究材料来源方面,国外研究综合利用了图片、访谈、档案、回忆录或自传等各种参考资料,极大扩展了口译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反观国内的口译史研究,起步较晚且代表性成果较少,2000年后虽然有所提升,但进展有限,在数量和研究水平上仍远远落后于国外的口译史研究,且没有代表性的高水平的博士论文。在研究主题上,国内口译史研究集中于唐以前口译史和近现代口译史,其他历史时期的口译史研究不足。此外,研究手段十分单一,基本上局限于公开出版的文献,对于图片、录音、档案、回忆录等材料的挖掘极其缺乏。但特别要指出的是,港台地区的口译史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如香港地区的Rachel Lung(龙惠珠)对中国古代口译史的探索(Lung,2005,2006,2013),Lawrence Wang-chi Wong(王宏志)对鸦片战争期间中外翻译事件和人物的挖掘(王宏志,2011,2012);Pin-ling Chang(张品羚)是台湾地区口译史的主要研究者,主要关注台湾17世纪处于荷兰殖民者占领时期和中荷战争期间的口译史(Chang,2014,2016)。对比而言,大陆地区口译史研究成果不如港台地区突出,除论文发表较少外,历届全国口译大会提交的与口译史相关的论文也屈指可数。总之,大陆地区口译史的研究虽然有《中国口译史》这样的里程碑式著作,但总体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议题狭窄,研究手段较单一。

4.2 对口译史研究发展的思考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几年,已经进入了迅猛增长的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应该看到,口译史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和缺陷。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4.2.1 口译史研究队伍整体规模较小,影响力不强。

在口译史的研究力量方面,团队有时会带动一系列成果的产出,当前口译史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团队是2008年建立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Alfaqueque,其活动可以追溯至2000年,成员来自西班牙

牙、德国、智利和意大利,代表人物是萨拉曼卡大学的 Jesús Baigorri-Jalón 和 Icíar Alonso-Aragués,该团队发表了一系列口译史的研究成果^④。在当前的口译史研究中,西班牙、日本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区是主力军,而英美等拥有丰富口译史的国家并没有在口译史的研究上贡献太多力量,这一方面削弱了口译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口译史研究的深化。因此,后续口译史研究应该加大国际学术交流,增强口译史的研究队伍,特别是形成协同能力强的团队。此外,还应提升口译史在英美等主流国家中的影响力,为后续口译史研究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4.2.2 口译史研究的时间和范围仍然不够广阔。

在国外,虽然口译史的时间可以从古埃及延伸到20世纪(Andres, 2013),但在研究时间上仍主要聚焦于中世纪西班牙等国家的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上半叶同声传译的发展等时期,对其它时期和英美等口译史较为丰富的国家研究不足。国内的口译史研究集中于唐以前的口译史(Lung, 2011; 赵贞, 2005)、近代口译史(叶霏云, 2014)和抗战时期的口译史(郁仲莉, 2016),其它时间段的口译史则少有研究。在研究主题上,主要集中于外交口译史(王宝平, 2007; 全相卿, 2013; 文静, 2015),研究主题亟待扩展。

4.2.3 缺乏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及地区间的比较研究。

历时的研究往往能折射出历史发展的变迁,对于了解口译史的动态发展很有裨益。在国内外不同时期的口译史研究中,当前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口译史,缺乏不同历史时期口译史的纵向比较。此外,对于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口译史也缺乏横向的研究,如中世纪西班牙在美洲殖民时期的口译史就与同一时期葡萄牙在美洲的口译史缺乏相关的比较研究。

4.2.4 口译史研究和口译教学实践联系不够密切。

口译史研究离不开不同场合下的口译实践,它们为口译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口译史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要想保持其生命力,必须将其纳入到口译教学和实践之中。然而,当前的口译史仍然偏重于历史事件和特定时期的译员史等理论研究,对其与教学和实践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口译史的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和译员的人文素养,对他们以后的口译实践意义重大,也有利于为口译史的研究培养一批生力军。因此,国内外应该紧密加强

口译史与口译教学、实践的联系,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学以致用,为口译史的长远发展提供动力。

5 结语

回顾口译史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其发展是与整个口译学科同步的。但是,长久以来,口译史研究不仅在翻译史还是在整个口译研究领域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Takeda & Baigorri-Jalón(2016: VII)在强调口译史研究的重要性时指出,没有历史的学科是没有未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口译史重新引起了口译学界和翻译学界的关注,并在近几年迎来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方面体现了口译史研究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口译史是口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献计量方式比较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的已有成果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希望为后续的口译史研究提供相应的指导。

注释:

①BITRA 是西班牙利坎特大学创建的口笔译文献数据库,全称 Bibliography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网址为 http://aplicacionesua.cpd.ua.es/tra_int/usu/buscar.asp?idioma=en。(2017-05-19)。

②TSB 是 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建立的翻译研究文献数据库,全称 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网址为 <https://benjamins.com/online/tsb>。(2017-05-19)。

③CIR 是由学者 Daniel Gile 于 1990 年创办的口译研究信息公报,全称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Research Bulletin,网址为 <http://cirinandgile.com/index.html>。(2017-05-21)。

④详情见网址 http://campus.usal.es/~alfaqque/index_en.html。(2017-05-21)。

参考文献:(因篇幅所限,仅列主要参考文献)

- [1] Arencibia Rodríguez, L. The Imperial College of Santa Cruz de Tlatelolco: The first school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sixteenth-century Spanish America [A]. In Bastin, G. & P. Bandia (eds). *Charting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C].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6: 263-275.
- [2] Baigorri-Jalón, J. *Interpret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 History* [M]. Translated by Anne Barr. Salamanca: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2004.
- [3] Baigorri-Jalón, J. Interpreters, photography and memory: Rabinovitch's private archive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16a(21): 1-16.
- [4] Baigorri-Jalón, J. The use of photographs as historical sources, a case study: Early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A]. In K. Takeda & J. Baigorri-Jalón (eds).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2016b: 167-191.
- [5] Bowen, D., Bowen, M. & Dobosz, I. The life of a diplomatic interpreter: An interview with Irena Dobosz [A]. In D. Bowen, & M. Bowen (eds). *Interpreting: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C]. Binghamton: SUNY, 1990: 23-33.
- [6] Bowen, M., Bowen, D. & Kaufmann, F., et al. Interpreter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A]. In Delisle, J. & J. Woodsworth (eds).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245-273.
- [7] Cáceres-Würsig, I. The *jeunes de langu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pain's first diplomatic interpreters on the European model [J]. *Interpreting*, 2012 (2): 127-144.
- [8] Chang, Pin-ling. Wartime interpreting during the Sino-Dutch War (1661-1662) [J].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 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16 (15): 51-71.
- [9] Chernov, S. At the dawn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 the USSR: Filling some gaps in history [A]. In K. Takeda & J. Baigorri-Jalón (eds).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6: 135-165.
- [10] Gaiba, F. *The Origin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The Nuremberg Trial*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8.
- [11] Gofman, E. A. Toward a history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J]. *Perevodchika*, 1963 (1): 20-26.
- [12] Harris, B. Ernest Satow's early career as diplomatic interpreter [J]. *Diplomacy & Statecraft*, 2002 (2): 116-134.
- [13] Hermann, A. Interpreting in antiquity [A]. In F. Pöchhacker & M.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56/2002: 15-22.
- [14] Kaindl, K & Spitzl, K. (eds). *Transfiction: Research into the Realities of Translation Fic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4.
- [15] Kellett Bidoli, C. J. Sign language and interpreting: a diachronic symbiosis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16 (21): 95-107.
- [16] Kurz, I. The rock tombs of the Princes of Elephantine: Earliest references to interpretation in Pharaonic Egypt [J]. *Babel*, 1985 (4): 213-218.
- [17] Lung, R. Defining Sillan interpreters in first-millennium East Asian exchanges [A]. In K. Takeda & J. Baigorri-Jalón (eds).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6: 1-25.
- [18] Mairs, R. 'Interpreting' at Vindolanda: Commercial and linguistic mediation in the Roman army [J]. *Britannia*, 2012 (43): 17-28.
- [19] Pym, A.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 [20] Roland, R. A. *Interpreters as Diplomat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World Politics*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9.
- [21] Sarmiento-Pérez, M.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the conquest and acculturation of the Canary Archipelago [J]. *Interpreting*, 2011 (2): 155-175.
- [22] Sibul, K. Interpreting in Estonia in a geopolitically changed Europe (1944-1991)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16 (21): 17-31.
- [23] Sawyer, D. B.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s Corps of Student Interpreters: A precursor to the diplomatic interpreting of today? [A]. In Takeda, Kayoko & Jesús Baigorri-Jalón (eds).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6: 99-133.
- [24] Stone, Ch. & Woll, B. Dumb O Jemmy and others: Deaf people, interpreters and the London court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J]. *Sign Language Studies*, 2008 (3): 226-240.
- [25] Takeda, K. *Interpreting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10.
- [26] Takeda, K. & Baigorri-Jalón, J. (eds).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6.
- [27] Torikai, K. *Voices of the Invisible Presence: Diplomatic Interpreters in Post-World War II in Japa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9.
- [28] Wolf, M. (ed). *Interpreting in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C]. London: Bloomsbury, 2016.
- [29] 郭婷. 译员职业化与译员培训——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军事译员培训与管理的个案研究 [J]. *翻译季刊*, 2012 (65): 31-60.
- [30] 黎雅秋. 中国口译史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 [31] 任萍. 记我国最早的翻译学校——明四夷馆考察 [J]. *上海翻译*, 2007 (2): 53-56.
- [32] 仝相卿. 宋朝对辽外交活动中的“翻译”初探 [J]. *史学月刊*, 2013 (8): 119-124.
- [33] 肖晓燕, 王继红. 手语翻译研究: 模式、内容及问题 [J]. *中国特殊教育*, 2009 (2): 29-35.
- [34] 王宏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 [J]. *翻译史研究*, 2011 (1): 82-113.
- [35] 郁仲莉. 媒体、叙事与日军翻译官: 以夏文运为例 [J]. *翻译界*, 2016 (1): 89-102.
- [36] 赵贞. 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 [J]. *南都学坛*, 2005 (6): 29-33.